

子海精華編

主編 王承略 聶濟冬

問學錄

三魚堂臆言

〔清〕陸隴其撰 秦躍宇點校



子海精華編

主編 王承略 聶濟冬

問學錄
三魚堂賸言

〔清〕陸隴其撰 秦躍宇點校

山東人民出版社·濟南

國家一級出版社 全國百佳圖書出版單位

圖書在版編目 (CIP) 數據

問學錄 三魚堂賸言/ (清) 陸隴其撰; 秦躍宇點校. -- 濟南: 山東人民出版社, 2018. 9
(子海精華編/王承略, 聶濟冬主編)
ISBN 978 - 7 - 209 - 11535 - 3

I. ①問… II. ①陸… ②秦… III. ①哲學—中國—清代 IV. ①B244. 75 ②B249. 9

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(2018)第 180028 號

責任編輯: 李 濤
封面設計: 武 斌

問學錄 三魚堂賸言

WENXUE LU SANYUTANG SHENGYAN

[清] 陸隴其 撰 秦躍宇 點校

主管部門 山東出版傳媒股份有限公司
出版發行 山東人民出版社
出版人 胡長青
社 址 濟南市英雄山路 165 號
郵 編 250002
電 話 總編室 (0531) 82098914
市場部 (0531) 82098027
網 址 <http://www.sd-book.com.cn>
印 裝 山東臨沂新華印刷物流集團有限責任公司
經 銷 新華書店

規 格 32 開 (148mm × 210mm)
印 張 6.75
字 數 100 千字
版 次 2018 年 9 月第 1 版
印 次 2018 年 9 月第 1 次
ISBN 978 - 7 - 209 - 11535 - 3
定 價 46.00 圓

如有印裝質量問題, 請與出版社總編室聯繫調換。

國家社科基金重大委托項目“《子海》整理與研究”成果

山東省社科規劃重大委托項目成果

國家社科基金重大委托項目“《子海》整理與研究”成果之一

《子海精華編》

工作委員會

主 任：樊麗明 王清憲

副 主 任：李建軍 胡金焱 劉致福 張志華

委 員(按姓氏筆畫排列)：

王 飛 王 偉 王君松 王學典 方 輝 巴金文

邢占軍 杜 福 李平生 李劍峰 吳 臻 胡長青

孫鳳收 陳宏偉 劉丕平 劉洪渭

編纂委員會

學術顧問：安平秋 周勛初 葉國良 林慶彰 池田知久

總 編 纂：鄭傑文(首席專家) 王培源

副總編纂：王承略 劉心明

委 員(按姓氏筆畫排列)：

王 瑋 王 震 王小婷 王國良 李 梅 李士彪

李玉清 何 永 宋開玉 苗 菁 郝潤華 姜 濤

馬慶洲 秦躍宇 高海安 陳元峰 黃懷信 張 兵

張曉生 單承彬 蔡先金 漆永祥 鄧駿捷 劉 晨

聶濟冬 蘭 翠 竇秀豔

審稿專家：周立昇 鄭慶篤 王洲明 吳慶峰 林開甲 張崇琛

徐有富 鄭傑文 唐子恒 晁岳佩

執行主編：王承略 聶濟冬

執行編纂(按姓氏筆畫排列)：

王成厚 王 娜 尹思琦 曲娟娟 李 兵 宋恩來

苗 露 柏 雲 柳湘瑜 張雨霏 賈 兵 蘇運蕾

編 務：張 櫻 劉 端 孫紅苑 沈 虎

本書審稿專家：唐子恒

《子海精華編》出版說明

“子海”，即“子書淵海”的簡稱。“《子海》整理與研究”課題係國家社科基金重大委托項目、山東省社科規劃重大委托項目。該課題分《珍本編》《精華編》《研究編》《翻譯編》四個版塊，力圖把子部珍稀文獻、精華文獻進行深層次的整理、研究和譯介，挖掘子部文獻的價值，促進子學研究的發展。

山東大學向來以文史見長。古籍整理與子學研究，是其中的傳統研究方向。“《子海》整理與研究”，是在山東大學前輩學者高亨先生積三十年之力陸續做成的《先秦諸子研究文獻目錄》的基礎上，由已故著名古籍整理與研究專家董治安先生參與策劃、設計的大型綜合研究課題。課題立項後，得到了宣傳部、教育部、財政部、山東省政府和山東大學的大力支持，學界同仁踴躍參與。《精華編》的整理研究團隊近兩百人，來自海內外四十八所高校和研究機構。在組織管理上，《精華編》努力探索傳統文化研究協同創新的新體制、新機制，現已呈現出活力和實效。

華夏文明是由多元文化構築而成的。中國古代子部典籍，

以歷代士人個性化作品的形式，系統性地展示了華夏民族的世界觀和方法論，立體性地反映了中華民族對世界文明發展的貢獻。其中，無論是宏篇大論，還是叢殘小語，都激蕩着歷史的聲音，閃爍着智慧的光芒，構成中國古代思想、藝術、科技和生活方式的主體內容。《精華編》通過對子部最優秀的典籍的整理，一方面擷英取粹，為華夏文明的傳播提供可靠的資源和文本；另一方面以古鑒今，為當下社會的發展提供智力支持和精神支撐。並希望進而梳理中華傳統文化的多元結構，繼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一貫文脈。

根據漢代以後子學發展和子部典籍的實際情況，參照官私目錄的分類與著錄，《精華編》選取先秦諸子、儒學、兵家、法家、農家、醫家、曆算、術數、藝術、雜家、小說家、譜錄、釋道、類書等十四個類目的要籍幾百種，編為目錄，作為整理的依據，而在成果展現上則不出現具體的類目。為統一體例，便於工作，《精華編》編有詳細的《整理細則》，并有簡明的《整理要則》，供整理者遵循使用。

《精華編》整理原則是，對每種子書的整理，突出學術性、資料性和創新性，力求吸納已有的整理成果，推出更具參考價值、更方便閱讀的整理文本。所采用的整理方式，大體有三種：一、部頭較大且前人未曾整理者，采用標點、校勘的方式整理；二、前人曾經標點、校勘者，或采用抽換更好或別具學術特色底本的方式整理，或采用集校、集注的方式整理，或采用校箋、疏

證的方式整理，或綜合使用以上方式；三、前人已有較好的注本者，則採用集注、彙評、補正等方式整理。

《精華編》採用五次校審、遞進推動的管理程式，即：一、初校全稿。子海編纂中心組織碩、博研究生，修改文稿錯別字，規範異體字，調整格式，發現並標明校點中的不妥之處。二、初審文稿。子海編纂中心的編纂人員根據情況，解決初校時發現的問題，並判斷書稿的整體質量。三、匿名評審。聘請資深教授通審全稿，全面進行學術把關，消滅硬傷，寫出審稿意見。四、修改文稿。子海編纂中心及時把專家審稿意見反饋給整理者。整理者根據審稿意見修改，做出新文稿。五、終審文稿。待新文稿返回子海編纂中心後，總編纂做最後的學術質量把關。五步程序完成後，將文稿交出版社。

五次校審的目的是為了保證學術質量，提高整理水平，減少錯訛硬傷。但校書如掃塵埃落葉，隨掃隨有，《精華編》雖經多道程序嚴加把關，仍難免有錯，懇請方家不吝指教。子海編纂中心將及時總結經驗，吸取教訓，把工作做得更好，以實現課題設計的初衷。

整理說明

一、其人與其書

陸隴其（1630—1693），初名龍其，因避諱改爲隴其，字稼書，浙江當湖人。據清吳光西等人所撰《陸稼書先生年譜》記載，他是唐代著名宰相陸贄之後，世居浙江當湖。明代當湖又析出平湖縣（屬嘉興府），陸隴其所居之地即歸平湖，故後來學者稱他爲“平湖先生”或“當湖先生”。陸隴其爲清代著名理學家，也是明清之際復興朱學的代表人物之一。明崇禎三年（1630）十月十八日，隴其出生於浙江平湖洧口（今屬新埭鎮）。崇禎八年（1635）入塾，塾師爲邑庠生彭元端，其人見隴其端重，視爲大器。崇禎十三年（1640）“四書”“五經”皆已卒業，又習《左傳》，暮歸必問其父，篝燈夜讀，翌日成誦。隴其幼年根柢經術，醇而後肆，儕輩莫不傾服。崇禎十七年（1644），清兵入關，隴其隨父倉皇奔避，仍手不釋卷。順治七年至十三年（1650—1656）爲塾師。

順治十四年（1657）鄉試不第，是年十一月歲試得一等第二名，補廩膳生，受到當時浙江學政谷應泰的賞識。順治十五年至康熙八年（1658—1669）仍為塾師，其間釐定科舉考試之制義體，編撰完成《增定四書大全》與《四書講義》，又取《性理大全》《文獻通考》《大學衍義補》《治平略》等書，親自抄錄，分門別類，匯成一編。康熙九年（1670）中進士，因選庶常不及，按例候選知縣。次年，完成《四書講義續編》。康熙十一年（1672）往嘉興拜會呂留良，大有相見恨晚之感，遂將自己與呂留良之講論錄入《衛濱日鈔》（後改名《松陽鈔存》），同年輯成《問學錄》。康熙十二年（1673）撰成《戰國策去毒》，是書謂《戰國策》文章之奇，足以悅人耳目，而機變之巧亦足以壞人心術，猶如厚味之中有大毒，故舉文士所共讀者，指示其得失，並以“去毒”名之。康熙十四年（1675）赴任嘉定（今屬上海）知縣，任職期間抑制豪強，整頓胥役，深受鄉民愛戴。康熙十六年（1677），吏部以其才力不及而降級調用，後又以處置盜案有諱盜之疑而判其落職。嘉定百姓為其呼冤，到督撫辯白，然無果。康熙二十二年（1683）十二月任靈壽知縣，上任之初作《自陳八款》，主張實政，始終力行。上任後，制訂“鄉規民約”，興修水利，獎勵農墾，減免賦稅，潔己愛民，被譽為“天下第一清廉”。在任期間，與百姓講論而作《六論集解》，與諸生講論《四書》而作《松陽講義》。康熙二十五年

(1686)，修編《靈壽縣志》告成。《靈壽縣志》為清代名志之一，是隴其取邑人傅維樑修訂之縣志加以改訂而成，凡三易稿，有“不登寺觀，斥異端也；不載坊額，尚閭修也；不及前人文字之彰著者，以己見正史也”之特點。次年，撰成《衛濱日鈔》，此即後來所謂《松陽鈔存》。康熙二十九年(1690)，被舉薦調任京官，後赴任四川道監察御史，協理山東道事。康熙三十年(1691)，隴其上奏三議：一曰編審人丁，宜痛除積弊；二曰積欠錢糧宜急豁免；三曰捐納保舉宜急停止。三議無果，遂上《速停保舉先用疏》，言辭激切，反對因一時軍需而實行捐納，且認為督撫保舉不當，選官良莠不齊，後遭彈劾，辭官回籍。後講學於東洞庭山，又在東泖顧書堵建“爾安書院”，專心講學著書，四方學者群聚門下。次年，病逝於泖口“三魚堂”故居，終年六十三歲。雍正二年(1724)從祀孔子廟廷，是清代第一位陪祀孔廟的儒者。乾隆六年(1741)贈禮部侍郎，謚“清獻”。^①

陸稼書可謂著作等身，然經其手定刊刻留傳後世的卻不多，大部分書稿由其好友和門生後學整理校定而付梓，纔有幸示以後世。關於稼書之著述，李元度在《陸清獻公事略》中有較為可靠的記載。參考其他相關資料，其所作大約有《四書大全》四十卷，《四書講義困勉錄》三十七卷、《續困

① 參閱[清]吳光酉等撰：《陸隴其年譜》，中華書局1993年版，第13—195頁。

勉錄》六卷，《松陽講義》十二卷，《古文尚書考》一卷，《讀禮志疑》六卷，《戰國策去毒》二卷，《問學錄》四卷，《三魚堂文集》十二卷、《外集》六卷、《附錄》一卷，《讀朱隨筆》四卷，《學術辨》一卷，《三魚堂臚言》十二卷，《松陽鈔存》二卷。此外，還撰成《一隅集》《呻吟語質疑》，校訂《學部通辨》，編修《靈壽縣志》，注《禮經會元》等。

陸稼書為明清之際尊朱辟王、踐履篤實的理學代表，在清初學術思想史研究方面具有較為重要的地位。其思想體系的建立與發展，代表了清初士大夫在學術上所做出的歷史選擇，這種選擇並非兀然而起，而是有其自身精神傳承和發展過程，因此須在明清學術思潮轉向中對陸氏思想加以探討。

明代君主集權專制達至登峰造極，當權者急需一種能夠維護自身統治地位的理論思想，而程朱理學對整肅社會秩序、維護倫理道德體系的重要作用使其在前期便被奉為官學。洪武三年（1370）明朝恢復科舉考試，內容就以程朱理學為主。成化年間（1465—1487）演為八股取士，逐漸禁錮士人，理學生氣蕩然無存。“自八股行而古學棄，《大全》出而經說亡”（《日知錄》卷十八《書傳會選》），顧炎武此言可謂切中要害。另一方面，就程朱理學本身而言，其崇仰“天理”，注重“格物致知”，但對常人而言卻難以把握，實無下手之處，陽明格竹之事便足見“格物”之病。且程朱理學又提出主敬涵養等修養方法，不免繁瑣複雜，被陸九淵譏為“支離”。正因如此，位居

官方正統的程朱理學漸呈疲態。隨後，陳獻章及其弟子湛若水，王守仁及其弟子王畿、錢德洪諸人打破了這一局面，尤以王守仁一派影響最大。守仁以明學術、正士風爲己任，放棄朱熹爲學之方，舍繁求簡，創立心學。相對於程朱理學，陽明心學則把天理從外部事物拉回到人的內心，提出心即理和心外無理等思想。如此一來，“格物致知”這一可望難及的過程，便被內心感悟所代替。陽明心學一脫程朱理學之經院習氣，充盈着生命體驗與智慧，大有撥雲見日之勢，時人確將其作爲救世良方，王學也自然占據了當時學術思想主流。然王學興盛之期不足數十年，最初的反省精神和創造力量便逐漸被後繼弟子消磨殆盡，陷入禪宗泥淖，露出虛無主義的傾向。在王門後學的鼓動之下，空談心性之風籠罩嘉、隆以後的整個社會，正如顧炎武痛切指出的那樣：“劉、石亂華，本於清談之流禍，人人知之。孰知今日之清談，有甚於前代者。昔之清談談老、莊，今之清談談孔、孟。未得其精而已遺其粗，未究其本而先辭其末。不習六藝之文，不考百王之典，不綜當代之務，舉夫子論學、論政之大端一切不問，而曰‘一貫’，曰‘無言’。以明心見性之空言，代修己治人之實學。股肱惰而萬事荒，爪牙亡而四國亂，神州蕩覆，宗社丘墟！”^① 梁啓超亦言：“晚明學風凋

^① [清]顧炎武著，陳垣校注：《日知錄校注》，安徽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，第384頁。

敝，流為狂禪，滿街皆是聖人，酒色財氣不礙菩提路。”^①“故晚明理學之弊，恰如歐洲中世紀黑暗時代之景教。其極也，能使人之心思耳目皆閉塞不用，獨立創造之精神，消蝕達於零度。”^② 陽明心學之價值雖不可一筆抹殺，但其末流積弊確使社會危機進一步加深，反動之起如箭在弦，晚明蕺山學派對於王學的反省已是先兆。

明崇禎十七年（1644），清軍入關，定鼎中原。新政權草創，危機四伏，為平息動亂、安定社會，清朝又將尊孔讀經、崇儒重道列為國策。康熙年間（1662—1722），程朱理學也再次被立為官學。在王朝鼎革的沖擊下，明清之際諸儒都不約而同地對明亡進行反思，並將其歸咎於王學的盛行，認為王學空疏之弊使得學術人心盡變，綱常名教掃地，指斥王學名儒實禪，視其為異端，從道統上加以摒棄，大張“尊朱黜王”旗幟，力主恢復程朱理學獨尊地位。雖然學術流弊並非明朝滅亡的決定性因素，但傳統理學確實在明清之際諸儒的聲討中出現了內部轉向，即從王學轉向朱學，從側重尊德性而趨向於道問學。

基於對學術的認知和時代的要求，稼書也形成了尊朱黜王、經世致用的思想。在理氣問題上，稼書主張理氣相依。

① 梁啟超：《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·近世之學術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，第101頁。

② 梁啟超：《清代學術概論》，中華書局2010年版，第12頁。

首先，理氣在時間上本無先後。如若理在氣先，那宇宙有一階段便是只有理而沒有氣的，“太極則爲一懸空之物，而能生夫氣矣”（《問學錄》卷三引薛瑄語），如此則氣就有生有滅，有端有始，顯然背離程頤所謂“動靜無端，陰陽無始”。其次，在實存上，理氣合一。他曾借孟子“浩然之氣”加以申明，認爲“《書》言人心道心，《易》言形上形下”皆是把理氣分而言之，給人理氣分處兩地之感，“而曰‘浩然’便已理氣合一，所謂器亦道，道亦器也”（《三魚堂賸言》卷六）。雖然稼書反復強調理氣渾融無間，但在邏輯分析上，他實際將理與氣分屬兩個範疇，而這種本體論反映在人性論上便是主張天命氣質不相雜。

在太極問題上，稼書從宇宙論與倫理論兩方面進行了探討，認爲就宇宙本體而言，“太極”與“理”屬相當範疇，是形上之本體，“萬理之總名”；就倫理本體而言，“太極”則是儒家倫理道德準則，是宗法等級禮儀制度的呈現。受清初實學思潮影響，他較少探討“太極”形上層面，而側重對“太極”道德踐履意義的闡發。在他看來，日用倫常之理應有實際著落，搭挂在日行之中，不能僅懸置於高處成爲玄思的對象。

在心性論方面，稼書多致力於心性之辨。他認爲性存在於心，是寓於心中的理，但性不是心。心是理氣之本，而性只是理。其次，他認爲心能知覺，而性不能知覺。性是理，理爲形而上者，是知覺背後之所以然，而非知覺本身。此外，

道心、人心問題可謂是其心性之辨的深入。他謹守朱子晚年定論，認為心是思維主體的具體意識，道心、人心皆是就已發而言，合乎義理者為道心，主於情欲者為人心，二者是同一知覺主體的不同思維內容。他又以周敦頤“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”（《太極圖說》）為依據，主張“道心常為之主，而人心聽命焉”（《三魚堂贖言》卷六）。

陸稼書對工夫論的詮釋是其整個理學思想中頗為重要的組成部分。他指出“世盡有言之克踐，而心實虛浮者”（《三魚堂贖言》卷三），是故學者所當致力處應是具體的為學工夫。在格物致知上，他主張“格物之外，無致知工夫”“致知者必教之格物”（《三魚堂贖言》卷五），欲以此抵制心學絕物致知的修養方法。在居敬涵養上，他認為“平時無主敬之功，則不能知；臨事無主敬之功，則不能慮。故君子之不可須臾離者，敬也”（《問學錄》卷二），延續了朱子持敬要“無一息之間斷”意，並將“敬”提到與“道”等高的地位。在他看來，主敬之精神有二，一曰主一無適，二曰戒慎恐懼。在“居敬”“窮理”之關係上，他主張“‘窮理’‘居敬’，必無偏廢之理”（《問學錄》卷二），既要敬自持，無思慮之紛擾，又要格物致知，真正從人情事變上體認義理。

《問學錄》與《三魚堂贖言》即是由上述思想指導著述成書。《問學錄》四卷成書於康熙十一年（1672），為稼書中年之作，是其學術傾向趨於明晰的代表之作。康熙十一年稼